

## “洛州無影”：《南海寄歸內法傳》中一條記載的最新考察<sup>1</sup>

王邦維  
(北京大學)

### 一、問題的由來

唐代僧人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是一部有關古代印度、東南亞以及中國佛教史的名著，全書四卷，其中卷三有“旋右觀時”一節，專門講當時在印度以及南海地區一日之中怎樣測定時辰：

又複時非時者，且如《時經》所說，自應別是會機。然四部律文，皆以午時為正，若影過線許，即曰非時。若欲護罪，取正方者，宜須夜揆北辰，直望南極，定其邪正，的辨隅中。又宜於要處安小土台，圓闊一尺，高五寸，中插細杖。或時石上豎丁，如竹箸許，可高四指，取其正午之影，畫以為記，影過畫處，便不合食。西方在處，多悉有之，名為薜羅斫羯羅（原注：彈舌道之），譯為時輪矣。揆影之法，看其杖影，極短之時即正中也。

佛教僧人依律而住，講究“時”與“非時”，因此“觀時”對持律的僧人們來說是一件很要緊的事。義淨對此講到不少。他講到在“觀時”一事上中國和印度以及南海方面的不同情形：

然瞻部洲中，影多不定，隨其方處，量有參差。即如洛州無影，與餘不同。又如室利佛逝國，至八月中，以圭測影，不縮不盈，日中人立，並皆無影。春中亦爾。一年再度，日過頭上。若日南行，則北畔影長二尺三尺。日向北邊，南影同爾。神州則南溟北朔更復不同，北戶向日，是其恒矣。又海東日午，關西未中。准理既然，事難執一。是故律雲遣取當處日中以為定矣。<sup>2</sup>

室利佛逝是南海中古國之一。義淨在唐鹹亨二年（671）十一月從廣州附舶，經海路往印度求法，最先到達的，就是室利佛逝國。十四年後，唐垂拱元年（685）冬天，義淨離開印度回國，途中又在室利佛逝停留達四年之久。<sup>3</sup> 義淨因此對室利佛逝瞭解最多。室利佛逝舊地，在今印尼蘇門答臘島南部，極盛時勢力甚至達到西瓜哇，馬來半島及加里曼丹島西部。室利佛逝的都城，一般認為即在今巨港（Palembang），其地剛好在赤道附近。<sup>4</sup> “至八月中，

<sup>1</sup> 本文的第六、七兩節部分內容來自作者新近寫成的《再說“洛州無影”》一文。該文將在新近出版的《唐研究》第十卷上發表。

<sup>2</sup> 《大正藏》第五十四卷，第 225 頁中至下以及拙稿《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中華書局，1995，第 167 至 168 頁。

<sup>3</sup> 參考拙稿《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附錄二“義淨生平編年”，中華書局，1988，第 253 至 267 頁。

<sup>4</sup> 參考同上第 46 頁。

以圭測影，不縮不盈，日中人立，並皆無影。春中亦爾，一年再度，日過頭上。若日南行，則北畔影長二尺三尺。日向北邊，南影同爾。”正是這一地理位置的最確切的寫照。這很容易理解。<sup>5</sup> 至於“神州則南溟北朔更複不同，北戶向日，是其恒矣。又海東日午，關西未中。”則更是常識。但義淨在這中間講到的“洛州無影，與餘不同”，卻無論如何使人無法理解。洛州即今天河南的洛陽，地理位置在回歸線以北，一年之中怎麼可能有無影的時候呢？十七年前，我整理和研究《南海寄歸內法傳》，工作進行到這裏，第一個感覺，是困惑不解。

## 二、高楠順次郎的解釋

同樣的問題在我之前其實已經有人遇到過。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 1896 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的《南海寄歸內法傳》的英譯本，是一部在學術界很有名的書。他翻譯到此，在這一段英譯文下加了一個注：

The province of Lo is probably Central India. Lo was the capital of China and the centre of 'all under heaven' and I-tsing may have once for all used it as meaning Central India, though very strange.<sup>6</sup>

高楠的注，雖然也算是一種解釋，但顯然他自己也覺得把握不大，說“這非常奇怪”。

## 三、我十七年前的看法

但是，洛州就是洛州，怎麼能把洛州一下子就說成是中印度呢？高楠順次郎的解釋，沒有根據，實在太牽強。我很難表示同意。但我自己也沒有更好的解釋。我只能認為，這可能是義淨的一個錯誤。因此，我在義淨書中這一段文字之下，寫下了我當時的意見：

義淨此處說誤。依字面講，洛州應指洛陽，但洛陽地處北緯三十四度至三十五度之間，一年中任何時候都不可能無影。這一錯誤或與以為洛陽為天下之中的看法有關。高楠此處把洛州解釋為中印度，雖然可以調和義淨說法中的矛盾，但從來沒有人以洛州一名指中印度。<sup>7</sup>

我的意見，批評了高楠順次郎，但實際上也不對。

## 四、十一年前的一個發現

---

<sup>5</sup> 八月中即秋分，春中即春分，日中即正午。據此室利佛逝則正在赤道之上，即包括今蘇門答臘島大部。《新唐書》卷二二一《南蠻傳》亦有“室利佛逝”條，其中講到：“室利佛逝，一曰屍利佛誓。過軍徒弄山二千里，地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遠。有城十四，以二國分總。西曰郎婆露斯。多金、汞、龍腦。夏至立八尺表，影在表南二尺五寸。”如果以此計算，這裏講到的立表位置，應在北緯六度許處，當在今馬來半島南部，當時屬於室利佛逝的一部分。關於室利佛逝，國外已經有不少研究的專著。見拙稿《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第 46 頁所引。我自己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再留意有關室利佛逝的新的研究著作。今年 9 月，在瑞典 Uppsala 大學的一個有關佛教的學術會議上，劍橋大學的 Janice Stargardt 博士告訴我，關於室利佛逝，近年來在歷史和考古方面有一些新的發現和研究成果。Stargardt 博士在她與 Denis Twitchett 最近合作寫成的一篇文章《沉船遺寶：一艘十世紀沉船上的中國銀錠》中就提到了這些發現和相關的資料。文章將發表在即將出版的《唐研究》第十卷上。

<sup>6</sup>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by I-Tsing, translated by J. Takakusu,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6, 第 143 頁。

<sup>7</sup> 《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第 167 - 168 頁。拙稿完成於 1987 年初並在當年 6 月作為申請博士學位的論文在北京大學通過答辯。

不過，當時的情況是，我雖然不同意高楠順次郎的意見，實在也另外提不出更合適的解釋，只好做出這樣的判斷。話雖然這樣講了，心裏依然不是很踏實，我覺得比較奇怪的是，我整理這部書時所使用的九個底本，包括八個古代的抄本或刻本，其中有的刊刻得很早，在這句話上都沒有差別，不大像是有抄誤或刻誤。我因此心中始終未能完全釋然。

時間就這樣過去了七八年。1993年9月，我去洛陽，參加在那裏舉行的紀念龍門石窟開鑿一千五百周年的學術討論會。會議結束後，我們被安排參觀洛陽附近的一些歷史古跡，其中一處是有名的登封市告成鎮古觀星台院中的“周公測景台”。台用石造，上立有表。就在這裏，我驚奇地發現，這座測景台，被當地人稱作“沒影台”。測景台旁有一段說明文字：

“夏至正午，表北之影長一尺五寸，正與石座北面上沿長度相等，所以看不出明暗差別，故俗稱為‘沒影台’。”

河南話的“沒影”，就是無影。我還需要哪里去找“無影”，這不正是“洛州無影”嗎？不是義淨的書中有錯，是我，當然還包括高楠順次郎，不知道有這座“周公測景台”，所以沒有弄清楚“洛州無影”這句話真正的意思。我心中關於“洛州無影”的困惑，居然不意之間得到了解決。

## 五、新的不同意見

參觀過“周公測景台”後，我以為我總算是找到了“洛州無影”的答案。但我一直雜務纏身，沒有時間把我的這點小小的發現寫成文章，報告給有興趣的朋友。時間又過去了六七年，2000年，我終於得到一個機會，以此為題，寫成一篇不長的文章，發表當年10月出版的《文史》的第3輯上，題目就是《關於“洛州無影”》。<sup>8</sup>我沒想到，真還有感興趣的朋友，注意到了拙文。中國文物研究所的鄧文寬先生，是研究中國古代天文曆法，尤其是敦煌曆書的專家。文寬先生跟我講，他讀過拙文後，有一些不同的意見。文寬先生把他的意見也寫成了文章，發表在2003年8月出版的《文史》第3輯上，題目是《“洛州無影”補說》。文中最主要的，是對究竟什麼是“無影”，提出了他的解釋。文寬先生認為，所謂“無影”，實際上是指“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適當與土圭等”，“日影與土圭一樣長，土圭北側端點以外沒有日影，也即‘無影’”。文寬先生同時還指出，拙文中有兩處“誤判”：一是我把這座“周公測景台”建造時間確定為在唐以前，再有就是我由此所說的“義淨當年則一定到過這裏，見過這座周公測景台”的推斷。<sup>9</sup>

## 六、最新的考察：究竟什麼是“無影”？

文寬先生是我的學長，又是多年的摯友。他對拙文提出意見，我非常感激。但我的感覺，與“洛州無影”相關的，有一些問題似乎確實還沒有說清楚。尤其重要的是，什麼是“洛州無影”，我們都沒有機會到過現場，做過即時實地的觀察，因此終究顯得還是缺乏充分的瞭解。我下決心要去看一看是不是真存在“無影”，“無影”究竟是怎麼回事？

2004年6月21日，是農曆的夏至，我與河南省文物局的兩位先生，專程到河南登封市告成鎮的古觀星台，實地觀察“無影”的情形。天公作美，是日萬里晴空，陽光燦爛，正是觀察“無影”的極好的機會。雖然氣溫高達37度，但絲毫沒有降低我們的興致。觀星台文

<sup>8</sup> 《文史》2000年第3輯（總第52輯），中華書局，第308至309頁。

<sup>9</sup> 《文史》2003年第3輯（總第64輯），中華書局，第194至197頁。

管所的工作人員講，夏至有這樣的好天氣，過去四年，從沒有過。過去幾年，一直有人，包括電視臺，打算來此地，觀察或拍攝“無影”，但都未成功。我們因此是很有運氣的了。

在此前的討論中，我早講過，從天文學的角度講，洛州在北回歸線以北，一年中的任何時候，都不可能無影。這是常識，不可改變，也無需討論。但問題就出在這兒：即使是本來有影，但在唐代，在洛陽的當地，就是有“洛州無影”這樣一個說法。義淨不過是在他的《南海寄歸內法傳》書中講到“觀時”的經驗時，記載了這個說法而已。

我們這天對測景台的觀察，從北京時間的 11 點半開始，一直到 13 點 1 刻結束。現在的測景台，台為覆鬥型。與地平相對，台的四個立面並不垂直，而是呈現為不大的斜面。台頂立有石表。台附近有樹，樹身頗高。樹蔭不時可以遮擋住石台前後的陽光，但石台和石表的大部分，仍然在陽光照射之下，各個方向的日影都很清楚。我們原來以為，“無影”應該出現在北京時間的 12 點正。等至 12 點正，情況並非如此。在石台正北的地面上，有石台的日影，也有石表的日影，日影稍微偏西。這時我們才突然想到，從天文時的角度講，北京時間的正午，未必就是當地的正午。當地時顯然比北京標準時要晚。於是我們繼續等候。日影逐漸縮小，到 13 點零 8 分，不僅在石台正北的地面上見不到石表的日影，石台自身的日影也完全消失。不僅北面如此，其他三方的地面上也是如此。石台旁邊的樹蔭，此時亦全部退開。以當地的天文位置為準，應該說此時就是太陽運行一年中的最高點，也就是夏至點。這時仔細觀察，陽光雖不是絕對垂直地射下，但射下的角度，剛好與石台正北立面的傾斜度相同，因此日影被掩藏了起來。不僅如此，石臺上石表的日影，這時也收縮至最短，長度剛好到石台北面上沿，與上沿齊平，因此原來映射在地面上的石表的日影也完全見不到了。“無影台”為什麼稱作“無影”，此時終於得到驗證。其中的道理，說簡單也簡單，但說它是一種巧妙想，也毫不過分。測景台北面鐫刻的聯句：“道通天地有形外，石蘊陰陽無影中”，描寫的正是這種情形。<sup>10</sup>

“無影”持續時間很短，前後僅一兩分鐘。到 13 點 10 分，日影重新出現，不過這時轉至石台正東的地面上。石台和石表，都是如此。“無影”的整個過程，我們都拍了照。現在稍覺可惜的是，當時不該只是照相，同時應該錄影。

以上是我們觀察的全部過程。以我直截了當的想法——我相信一般人也會這樣理解——這裏講的“無影”，就是指在這樣一種場合下地上太陽光影完全消失的情形。如果沒有“周公測景台”特殊的設計，這是不可能的。“紙上得來終覺淺”，如果僅僅從書本上去體會，不親眼見到，相信對此不會有很深的感受。義淨講：“洛州無影，與餘不同。”這種情景，對於當年的古人，大概也會留下同樣深的印象。

至於文寬先生因為“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適當與土圭等”，認為“日影與土圭一樣長，土圭北側端點以外沒有日影，也即‘無影’”，這樣的解釋，我以為與這種情形恐怕並不相合。《周禮·地官·大司徒》有關一段講：“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蔭。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玄注則引鄭司農即鄭眾的話作進一步的說明：“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適當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sup>11</sup> 這兩段話，在各種書裏被人反復引到。<sup>12</sup> 但無論是《周禮》，還是鄭玄的注或者

<sup>10</sup> 這副對聯不知道撰成於何時，但至少不會是當代人的作品。在河南當地，知道“沒影台”的人不少，但知道義淨書中講到過“洛州無影”的人似乎不多。我問過一些河南文物考古界的朋友，他們說沒想到義淨的書會提到這件事。

<sup>11</sup> 《周禮注疏》卷十，《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阮元刻本，上冊，第 704 頁。

<sup>12</sup> 例如各種正史中的《天文書》或《天文志》。與陽城觀影最密切相關的，是《舊唐書》卷三十五《天文志》中“日晷”一段和《新唐書》卷二十一《天文》中“中晷之法”一段。中華書局標點本，《舊唐書》第 4 冊，第 1303 至 1308 頁和《新唐書》第 3 冊，第 812 至 816 頁。唐初人對陽城為“地中”的看法，亦可參考《晉書》卷十一《天文志》，中華標點本，第 2 冊，第 287 頁。《晉書》所記雖限於晉代史事，但撰寫者房玄齡等俱為唐初時人。

說是鄭眾的話，都說得明明白白，不是無影，而是有影，只有影長或影短的不同，夏至之日影長一尺五寸。這其中哪里提到“無影”，或者有“無影”僅僅是指一尺五寸之外無影的意思呢？此時日影既然只有一尺五寸，一尺五寸之外當然無影，何需多說？又何需另作曲折的解釋？

中國自古以來以豫州即洛陽一帶為天下之中，如果從建表觀天而言，陽城則更被認為是中心的中心。正因為古人以陽城為“地中”，陽城的日影一尺五寸，土圭於是也就設計為同樣的尺度。但讓“測景台”在夏至正午整體看起來“無影”，卻一定是要另費一番心思的。

我對天文史所知甚少，以我有限的見聞，這樣的情形，在其他地方、其他國家似乎還沒有聽說過。

## 七、測景台建於何時與義淨是否到過此地？

現在討論相關的另一個問題：在義淨的時代，也就是在唐初甚至在唐以前，在現在告成鎮的古觀星台這個地方，是不是就有這座“周公測景台”？文寬先生的看法，這座“周公測景台”，建造的時間是在唐開元十一年（723），也就是說，是在義淨去世之後，義淨當然也就不可能見過這座測景台。

對這個問題，我依然維持我一開始就有的看法。告成鎮即古代的陽城。《新唐書》卷三十八《地理志》“河南府河南郡”條講到陽城：“有測景台。開元十一年，詔太史監南宮說刻石表焉。”<sup>13</sup> 文寬先生的看法，根據的就是這條記載。但對此我的理解正好相反。《新唐書》講的，是開元十一年在陽城這個地方，就已經建有一座測景台，南宮說所做的事，是在這座測景台刻立石表。當然，我們今天見到的“周公測景台”，如果把石表看成是南宮說刻立的原物，石台因此也有可能由南宮說同時建造。但無論如何，我相信在南宮說之前，這裏一定是有一座測景台的，同時這座測景台還一定要能夠表現出“無影”的效果，並且廣為人知。否則，義淨不會講到“洛州無影”。

對此其實還有其他的證據。《通典》卷二十六《職官》記載：“儀鳳四年五月，太常博士、檢校太史姚玄辯奏於陽城測影台，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影有尺五寸，正與古法同。”<sup>14</sup> 這說明，不僅在南宮說“刻石表”之前，而是在唐儀鳳四年（679）之前，陽城即建有測影台。至於這座測影台是不是早到周公的時代，是周公的原物，可以討論，也可以懷疑。但如果說，姚玄辯提到的陽城測影台，是南宮說“刻石表”的基礎，也就是今天我們見到的“周公測景台”的前身，我想應該可信。

支持這一點的，還有一個證據。《周禮注疏》的作者賈公彥對上引《周禮·地官·大司徒》測影以定“地中”的一段話以及鄭玄的注又有一段疏解：“鄭司農雲：潁川陽城地為然者，潁川郡陽城縣是。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sup>15</sup> 這個古跡，無疑是指姚玄辯提到的陽城測影台。

賈公彥撰《周禮注疏》，約在唐高宗永徽年間（650—655），時間比姚玄辯陽城測影還稍早一點。賈公彥和姚玄辯的時代，都比南宮說早，正與義淨同時。

對於測景台的歷史，今觀星台院內有牌，上有說明，其中一段我認為講得合情合理：

周公測景台，又叫“測影台”，學名“八尺表”，俗稱“無影台”。是我國古代立八尺表土圭測影的遺制，是測量日影。驗證時令季節的儀器。周文王四子（周公姬旦）為營建洛陽曾在此測驗日影。唐開元十一年（西元723年），太史監南宮說等人仿以周公土圭之制換以石圭石表。

<sup>13</sup> 中華書局標點本，第4冊，第983頁。

<sup>14</sup> 中華書局本，1988年，第739頁。鄧文中已引。

<sup>15</sup> 同前引《周禮注疏》注。

意思是當年周公測影，是在這個地方，在南宮說“刻石表”之前，這個地方曾立有日表。這樣的推斷，我以為可以接受。因為我相信，南宮說建石表和石台時，沒有特殊的理由，不可能另選新址，最大的可能是在傳說的或者說已經標定的周公測影的地方，仿周公測影的規制，刻立一個新的石表。現成的地方就是賈公彥和姚玄辯提到的陽城測影台。這裏“北依嵩山，南望箕山。處潁河之濱”，對於古人做天文觀測，是一個優越的位置。選擇在這裏建測景台，無論最早是不是周公，在當年都不是隨意所為，而且這在歷史上自然還會有一個前後繼承的關係。在這個地方測過日影的，我們知道的，唐代至少有姚玄辯、南宮說和一行，元代有郭守敬。既然陽城自古以來就是測影的重要地點，同時唐初就有明確記載，在這裏已經建有測影台，我們又沒有其他的理由，為什麼不可以相信，在唐以前，陽城的測影台也是建在現在觀星台的這個位置的呢？

不過，現在看南宮說刻立的這個石表，恐怕是紀念性的意義大於用於實際觀測的目的，因為在它刻立所在的現在這個形狀的石臺上，很難設置水平。而且，如果再要在冬至測冬至點，就更不方便。它最大的功用，除了紀念“周公營洛，建表測景”這一傳說中的歷史，估計就是在夏至之時，以“無影”的方式顯示這裏就是“地中”。

因此，總結起來說，我以為在南宮說以前，在今天“周公測景台”這個地方，有一座測景台，而且也是“無影台”。從這一點考慮，說唐初義淨來過這裏，在這裏見過一座測影台，不能算是無端的推論。<sup>16</sup>

## 八、“洛州無影”：為什麼要如此？

從我上面的介紹中，我們看到，夏至之日，在登封的“周公測景台”，由於特殊的設計，“洛州無影”確實是“可能”的。我們實地的觀察對此已經做了證實。但隨之而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古人為什麼要這樣做，它有什麼樣的象徵性意義？

對這個問題，我也考慮了很久，我以為，這應該說與古代中國人以豫州或者說洛陽為“天下之中”的觀念有關。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簡單地提到。

把中原地區看作是“天下之中”，這樣的觀念，在先秦時已經出現。“地中”的說法，見於《周禮》，其中已經隱含有“天下之中”的意思。<sup>17</sup> 這種觀念，在漢以後逐步定型。到了隋唐時代，成為普遍接受的說法。唐初洛陽更一度是國家政治的中心，大唐盛世，天下一統，更會加強這種觀念。<sup>18</sup>

義淨的書中講：“瞻部洲中，影多不定，隨其方處，量有參差。即如洛州無影，與餘不同。”這裏的關鍵，是“與餘不同”。“無影台”要造成的效果，就是要“與餘不同”。<sup>19</sup> 哪

<sup>16</sup> 由“周公測景台”，我想到最近受到很大關注的周原“周公廟”遺址考古的新發現。對於古代歷史中有傳說的，看來我們需要重新考慮。“疑古”也需要有一定的限度。古代的一些歷史傳說，既不可完全接受，但也不能輕易否定。

<sup>17</sup> “地中”亦即“天下之中”，這樣的理解，應該沒有問題。孫詒讓《周禮正義》相關的解釋是：“地中者，為四方九服之中也。《荀子·大略篇》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孫詒讓的話，帶一點清儒的學究氣，但講得大致不錯。

<sup>18</sup> 不講文獻中有關“洛中”的記載。在去古觀星台之前，我們順便參觀了嵩陽書院。在嵩陽書院中，我見到一幅“嵩山會善寺顏真卿碑”的拓片，上書三個大字：“天中山”。大字下則書題記：“周公營洛，建表測景，豫州為天下之中，汝南又豫州之中。顏真卿書。”碑為顏字無疑，但為後代摩刻。碑上有說明：“此碑向在汝陽道中。壬寅冬摩刻於此。蜀西何其祥立石。”顏真卿所講，正是唐代一般人的說法。不過似乎顏真卿認為，天下之中在豫州，但豫州之中不在陽城，而在汝南。

<sup>19</sup> 古代中國人以自己居住之地為天下的中心，其心理態勢完全可以理解。早期中國存在不同的族群，因此也有不同的“天下之中”。參見蒙文通先生《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載《古學甄微》，巴蜀出版社，1987，第35—66頁。蒙先生以《山海經》的研究為題，討論及此，有極精到的意見。古代人尤其是中國人的天下觀與中心觀，其實是一個有意思的題目。參見羅志田《先秦的五服制與古代的天下中國觀》，載《學人》第10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第367—400頁。羅文引邢義田《天下一家——中國

一點“與餘不同”？因為這不是一般的地方，是“地中”，也就是“天下之中”。只是我們不知道，義淨本人在講到此事時，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究竟有多大的深度。

無獨有偶的是，在印度，也有一個稱作“中國”的地方。古代印度，大分為五個部分，稱為“五印度”，或者稱為“五天竺國”。其中央的一部分，稱作 *Madhyadeśa*，譯成漢文，也是“中國”。<sup>20</sup> 但這是印度之“中國”，而非中國之“中國”。而且，我的印象，印度人，尤其是古代的印度人，看他們的“中國”或“中心”，似乎更多的是從地理方位的角度考慮，政治文化方面的含義則比較淡薄。這與中國的情形有些不一樣，其中是否體現出中印兩國文化傳統和心態的某些不同？<sup>21</sup>

佛教傳入中國後，翻譯出大量的佛經，佛經以及中國求法僧的著作中，不時提到這個“中國”，而把中國人的中國反而稱作“邊地”。這往往引起一部分中國人，尤其是不瞭解這裏“中國”一詞的來源或者是不信仰佛教的中國人的反感和反駁。典型的一個例子，是清代四庫館臣對東晉僧人法顯的《法顯傳》書中有關印度的“中國”一段的批評。<sup>22</sup> 其實，不管是中國還是印度，所謂“中國”或“天下之中”，其實都不過是以自己為中心而形成的一種觀念。天下原本是沒有中心的。

古代的中國人把自己所處的地方看作是天下的中心，這並不奇怪，我們驚奇的只是，怎麼能想得出這樣一種辦法來把這種理念象徵性地表達出來？為了證明是“天下之中”，對做太陽觀測用的測影台和測影表做出這樣特殊的設計，由此造出“無影”的奇觀。這種情形，以我有限的見識，我以為，大概古今中外是絕無僅有。

## 九、附言與結語

在結束本文之前，應該附帶講一下我們在現場的一個可能也算有意思的發現。在“周公測影台”的北面，是元代郭守敬在至元十三年（1276）建造的觀星台。這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天文建築之一，古觀星台因此成為國家重點保護的文物遺址。我們在觀察“無影”的同時，還發現一個現象，在正午時分，陽光照射下的這座觀星台的主體建築，也是“無影”。原因也很簡單，觀星台北面牆體的建築收分，剛好與陽光的斜度一致。這是建築設計時郭守敬的有意而為，還是一種巧合，我說不清楚。講出來，供有興趣的人參考。

最後，再多說一句話。我的印象中，我們今天開會的京都，在古代日本也曾被稱作“京洛”。這個名稱從中國來，也就是來自洛陽。不過在日本似乎從來沒有“無影”的記載，大概日本人也從來沒有把自己所在的地方看作是“天下之中”。

---

人的天下觀》，原文未見，但題目很有意思。對這個题目的討論甚至還可以擴大至中國以外。

<sup>20</sup> 參考 B.C. La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ncient India*, Delhi: Ess Ess Publications, 1976, pp. 11-15.

<sup>21</sup>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講，古代印度人似乎不太計較哪里是“中心”和誰在“中心”。有趣的是，中國人即使講到印度的事，卻往往也試圖確定一個中心。這方面可以舉一個例子，例如“梵音”應該以哪里的“梵音”為標準的問題。參見季羨林《所謂“中天音旨”》，載《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臺北：東初出版社，1995，第 393—428 頁。這其中中國人的心態是否值得玩味？

<sup>22</sup> 《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一，史部地理類四“外紀”：“其書以天竺為中國，以中國為邊地，蓋釋氏自尊其教，其誕謬不足與爭。”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1。第 630 頁。

